

对文字的敬意

——止庵《喜剧作家》编辑手记

■杨爽



1987年,诗人西川、欧阳江河等参加诗刊社举办的“青春诗会”,提出“知识分子写作”;小说家方方发表《风景》,池莉写下《烦恼人生》,格非创作《迷舟》,苏童完成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》……这一年,止庵决定,停止小说和诗歌写作。



《北京方言词典》对剧的解释

我们翻遍了词典,也在网络上一搜再搜,甚至在满屋的书架上寻找可能的帮助,但直到我们离开都没能解决。随后不久,止庵在微信群里发出两张照片,一张“《北京方言词典》”,一张“ci”(二声)字解释页,附文:这本词典里是“左犀右立刀”,但《辞海》无此字。

这个人们仍在用着的说法(字),只存在于多年前的方言字典里,而这样一本字典,又很难在另一户人家找到。至此,参照造字是最为妥帖的做法。

这是我第一次与作者在如此细节的部分,做深入的探讨,用“咬文嚼字”形容那个下午一点都不夸张。止庵的版权代理人沈山说,止庵对文字是有研究的。能有这么一个下午,特别难得,也特别有收获。

我喜欢这个年代的作家,他们对文字有着最崇高的敬意。

《喜剧作家》的五个故事中,《姐儿俩》是消磨,《走向》是缠绕,《墨西哥城之夜》是撕破,同名小说《喜剧作家》是现世,而《世上的盐》则是幻想,通通带着孤独,娓娓道来,不必悲也不必喜。关于“喜剧作家”,大概要迫到鲁迅那儿,他曾说: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,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。止庵由此引申:悲剧和喜剧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生的本质的认识,悲剧是以“人生”、“有价值”为前提,喜剧是以“人生”、“无价值”为前提。悲剧是正的,喜剧是负的;悲剧是向上的,喜剧是向下的;悲剧最终张扬人生的价值,喜剧最终消解人生的价值。

这就是《喜剧作家》。

五年前,我向止庵约稿,虽结果未能如愿,但那一答一复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私藏的秘密。也因此,我了解到早在三十年前,止庵曾焚烧掉自己年轻时写的几十万字小说手稿。他后来在《挽歌》中写道:“经卷废弃似纷纷白骨,/清风翻卷,一篇即是百年,/皓首的书生茫然无归,/不知在哪里写剩余的诗句。”此后,他很快封笔,停止了小说和诗歌的写作。

去年初秋,一部止庵的小说集《喜剧作家》被交到我的手中,竟是当年幸存未毁的五部短篇小说。它像带着风尘,远道而来,孤零零的,却不悲伤。而我则像见了故人,边读边猜想这些年它的遭遇,也边读边寻找那个年轻的作家。

对于过往作品,止庵总说“悔其少作”“幸未谬种流传”,他是不愿被人高抬的,一遇到夸赞,就转移视线,在他身前的小范围地面上来回游离,两只手也跟着抬起来,掌心向下,拍打空气似的,有节奏地压一下、再压一下,带着腼腆的笑,反复说着:没有没有,太不好意思了,谢谢谢谢。可爱又慌张。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中,这个细节出现了好多回,每次都让我联想到孩子,像个老男孩儿。

不过“悔”也好,“少”也罢,总该与过去连结也对它交代,于是在小说集的卷首,止庵添加了题记,摘自马克·斯洛宁《苏维埃俄罗斯文学》一书中关于茨维塔耶娃的部分,里面说:“她置身于历史之外生活、幻想和创作;她也意识到这一点,有一次说道:‘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。’”由此,止庵便借来概括他笔下的那些人物——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。

若说这部小说集的出版,是重又找回,倒也不妥。在1986年止庵停止小说和诗歌的写作之前,在这两个领域,他仅署名“方晴”。停笔三十年后,他从友人的地下室翻出这些以“方晴”落款的泛黄手稿,面对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距离,心叹道:去日苦多,人寿几何。如今《喜剧作家》以“止庵”为名出版,对他来说,“方晴”从此成了前世。

小说集的编辑工作,多在细节,我们为此也确实有过几次争论。从线上到线下,语音、通话直到最后登门核对。多是近年不再使用的次选词,或俗语中无法查询的生僻字。在高楼林立的望京,止庵的书房里有另一种宁静,我装着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一页一页地对照文稿,更新当下标准里对于字词的选择。每听到一些在“音形义”方面曾用字更胜一

筹的例子时,止庵摘下眼镜,仔细查看,略带苦恼地说:“这些字都没啦,哎呀,太可惜了,太可惜了。”过一会儿又问我:“咱们能不能保留,为这些‘字’做点什么,不想它们因标准而消失。”我当然点头,那厚厚的词典只是一层保护色,把问题指出来是因为那是编辑的职责。

特别的是,在核对北京话中表示“给鱼刮鳞”所用的动词时,

古人说三不朽,上者立德,中者立功,下者立言。立德,除个人修行,还得靠机缘。颜回若非沾了孔子的光,其修行恐真不易为人所知。立功,则个人努力可致,当然也要靠世乱或御边的机会。只有立言,人人都可做,存世古籍汗牛充栋,每位发言者真能不朽吗?天知道。

郭子仪出身华阴郭氏,武举及第,从左卫长上(《旧唐书》本传作长史,误,此从《郭家庙碑》碑阴题名)做起,快六十岁了,方任九原太守兼朔方节度右兵马使。在十节度中,朔方军实力不在前列。

安史之乱给郭子仪带来做梦也想不到的机缘,他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,率军从灵武东讨,出晋北,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联手,扭转唐廷在叛乱初期的不利形势。身陷叛军占据长安城中的杜甫,最初对郭并不看好,《哀王孙》云:“朔方健儿好身手,昔何勇锐今何愚。”后来的变化出乎预料,到乾元元年末,除河北外,叛军仅盘踞邺下一隅。杜甫《洗兵马》:“中兴诸将收山东,捷书夕报清昼同。河广传闻一苇过,胡危命在破竹中。只残邺城不日得,独任朔方无限功。”又说:“成王功大心转小,郭相谋深古来少。”给以充分肯定。即便邺下兵溃,依然信赖郭子仪。《新安吏》云:“况乃王师顺,抚养甚分明。送行勿泣血,仆射如父兄。”仆射就指郭子仪。

代宗初年,叛乱基本敕平,论功以郭子仪、李光弼为最。光弼在乱平次年去世,子仪更显突出。他的功业盈满,引起皇帝身边亲信宦官的猜忌。肃宗后期已有所感,他都躲开了。代宗初年,功高不赏之恐惧更加强烈。据说宦官害其功,使人盗掘郭家祖坟。当然是奇耻大辱,部将劝子仪

濠上漫与

郭子仪的生存智慧

■陈尚君

辑盗,子仪拒绝,上朝自请有罪:“臣领师徒,出外征伐,动经岁年,害人之兄,杀人之父多矣。其有节夫义士,刃臣于腹中者众。今构隳辱,宜当其辜。但臣为国之心,虽死无悔。”领军打仗多年,无论杀敌或是战亡,父兄死亡怨恨者太多,祖坟被掘,权当赎还自己之罪愆。说得坦荡。

论赏功业,子仪获赠豪宅,占了京城亲仁里一半。他知功高震主,无端猜忌或传闻都可能给自己和家族带来祸害。他的设计出乎所有人意外,在自家豪宅中通大路,开商店,“里巷负贩之人,上至公子簪纓之士,出入不问。”他家女眷梳洗,路人都可以见到。他家子弟不了解他的苦心,哭着劝谏:“大人功业已成,而不自崇重,以贵以贱,皆游卧内。某等以为虽伊、霍不当如此也。”你老人家功业巍巍,应该森严庄重一些,至少家里应该是一个私密的空间,干嘛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出入卧室以内,前代伊尹、霍光辅佐人主,也从来并不如此啊。郭子仪答道:“尔曹固非所料。且吾官马食粟者五百匹,官饷者一千人,进无所住,退无所据。向使崇垣扃户,不通内外,一怨将起,构以不臣。其有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,则九族壅粉,噬脐莫追。今荡荡无间,四门洞开,虽谗毁是兴,无所加也。吾是以尔。”(引文见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七六

引胡璩《谭宾录》,胡书内容多取国史实录,相当可靠。)说明白了,我地位高,随从多,马有千匹,从官千人,相随住在京城,如果高宅深院,内外不通,必然引起许多猜恨。贪功害能之人何代不有,但凡有人怀怨,诬告有不臣之心,将何从解释,闹不好会招来株连九族的大祸。现在我四门洞开,示人以坦荡,即便有人诬告,也不会招致祸事。

他在功高盖世之际,没有头脑发热,而是周慎惧满,知道自古功高招祸,以盈满为诫。当然,生活奢侈一些,享受一些,皇上都不会计较,将军有疾,将军好色,都是人情之常吧。

郭子仪谨慎小心,自污避祸,难向家人透底说穿,家人未必明白。代宗因其功高,将女儿升平公主嫁其次子郭暧。

当了驸马的郭公子,却与公主始终没有协调好,古称“琴瑟不谐”。小两口常吵架,不知什么起因,某次郭暧居然骂公主说:“倚乃父为天子耶?我父嫌天子不作。”你以为你老爹是皇帝,就可以摆公主的架子吗?其实你爹做皇帝,是因为我老子嫌皇帝事烦,不想做,才让你爹做的。

公主被骂哭了,马上打道回宫,亲口询问乃父。好在这位皇上还算明白,知道是小两口胡闹,劝慰公主:“汝不知,他父

实嫌天子不作。使不嫌,社稷岂汝家有也?”说着说着,自己也觉得委屈,“因泣下,但命公主还。”还是让女儿回去委屈吧。郭子仪听闻,知道事情闹大了,于是“拘暖,自诣朝堂待罪”。皇上当然再次大度,劝慰郭子仪:“谚云:‘不痴不聋,不作阿家阿翁。’小儿女子闺帏之言,大臣安用听?”阿家即阿姑,“阿家阿翁”即今所谓公婆。《释名》卷二引“不瘖不聋,不成姑公”。隋代长孙平也曾引鄙谚作“不痴不聋,未堪作大家翁”。民间处事的基本原则,即小辈的恩爱怨骂,长辈不要过分当真,不然家族恩怨将无穷无尽。看来这位皇上还读过些书。

当然,从代宗的立场说,郭子仪毕竟权重内外,不能轻易动摇,乐得做和事佬。郭子仪明白伴君如伴虎,过了这趟,还不知道以后如何,于是将郭驸马杖打数十,让浑小子长些记性。以上所引皆见唐·赵璘笔记《因话录》卷一,后来戏曲《打金枝》即据此敷衍而成。

《旧唐书》本传说郭子仪:“前后赐良田美器,名园甲馆,声色珍玩,堆积羨溢,不可胜纪。代宗不名,呼为大臣,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,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,权倾天下而朝不忌,功盖一代而主不疑,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,富贵寿考,繁衍安泰,哀荣始终,人道之盛,此无缺焉。”安史乱后,郭子仪活了近二十年,权倾天下,功盖一代,享尽富贵,家族昌盛,很大程度缘于他的惧盈畏祸。他的部将子孙,在中晚唐政治舞台上始终活跃。郭暧与公主所生女后为宪宗妃,生穆宗,尊为郭太后,更被认为穆、敬、文、武四朝大内之实际掌控人。真乃福荫云仍,德泽绵长。